

# 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新核心新部署

王 刚\*

十八届六中全会专题研究全面从严治党问题,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完美收官。那么,十八届六中全会关于全面从严治党问题提出了哪些新要求?面临着哪些新挑战?为什么要确定“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度治党进行了怎样的新布局?

## 一、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新挑战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赋予全面从严治党新的内涵,强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党,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sup>①</sup>。这深刻阐释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内涵: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核心。这是从本质上对全面从严治党的深刻揭示,从而厘清了全面从严治党与加强党的领导的内在关系。这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共产党自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不是也不能是别的群体、组织和个人。由于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是中国共产党自身,因此,只有加强党的领导,才能保证全面从严治党的方向和方法正确,才能保证全面从严治党的目标和成效。另一方面,全面从严治党是从根本上更好地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大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之所以积极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其目的就是始终牢牢盯住坚持党的领导这个核心要素,并通过全面从严治党来保证党的领导的真正落实。二是“全面”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基础。所谓“全面”就是全方位、全覆盖、全过程管党治党;就是面向所有党组织、所有党员、所有领域、所有方面,重点是抓住“关键少数”<sup>②</sup>。首先是治党“对象全面”。把党作为一个整体来考量,全方位、全覆盖。治党既包括全体8800多万党员,也包括440多万个党组织;既抓住领导干部这一“关键少数”,又拓展向基层普通党员。党的各级组织、各级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既是主体,也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客体;既是监督者,也是被监督者;既是依靠对象,也是治党的对象。其次是治党“内容全面”。既包括思想、组织、作风、反腐倡廉和制度建设等各方面内容,也包括治标和治本等方面内容;既包括制度“治行”,也包括党性教育“治心”。再次是治党“目标全面”。全面从严治党既治

---

\*法学博士,南京师范大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210023。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习近平总书记意识形态建设系列重要讲话的理论贡献和实践要求研究”(15ZDA002)和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研究”(14MLA002)的阶段性成果。

①②《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11、11页。

标又治本,既抓大又抓小,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最后是治党“方法全面”。全面从严治党既惩戒又激励,既靠教育又靠制度;既有党内监督又有党外监督。三是“严”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关键。“严”就是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应当承认过去在管党治党方面存在宽松软的现象,这给党的形象和战斗力造成了极大的伤害。“严”就是要把“严”贯穿到管党治党的各方面,贯穿到党的建设的全过程。“严”要从治标做起。十八大后,中央出台八项规定,狠抓作风建设。“严”要一视同仁、一以贯之。既打“老虎”,又拍“苍蝇”,反腐败压倒性态势逐渐形成。“严”要从治本做起,要加强制度建设和纪律的严格执行,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面。四是“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要害。治党是激浊扬清、刮骨疗毒、倡优汰劣,是中国共产党给自己治病。既然全面从严治党是中国共产党给自己治病,那么,党的各级组织要担负全面从严治党的主体责任,党委书记要担当“第一责任人”,各级纪委要履行监督等的职责,党员要行使自己的权利,积极严格之“治”、认真之“治”、及时之“治”<sup>①</sup>。

当前,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内涵,面临着新的形势和新的挑战。就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形势而言,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时间之维:“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整体设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时间为维,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进行了整体设计。三中全会对全面深化改革进行了总部署,通过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四中全会开启了全面依法治国的新时代,通过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五中全会聚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以新发展理念布局“十三五”规划;六中全会聚焦全面从严治党,开启了新形势下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征程。

二是历史之鉴:中外管党治党的历史经验教训。首先,从中国共产党自身建设来说,从严治党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一贯要求和优良传统,我们党始终坚持把从严治党贯穿到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和反腐倡廉建设的各项实践中。自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就一直按照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标准管党治党。早在1927年9月,毛泽东在三湾对秋收起义部队进行改编时,就创造性地提出“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奠定了党的自身建设重要的组织基础;1929年12月,在古田会议上,毛泽东又创造性地回答了用先进的思想理论武装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确立了思想建党原则,形成了党的自身建设独特的政治优势。延安整风运动独创了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对全党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形式。1949年3月,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专门论述了党的作风建设,郑重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sup>②</sup>解放战争时期,党开展了整党整军运动,使“全党全军和人民群众密切地结合起来”<sup>③</sup>。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在开展整风整党运动中处决了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改革开放以来,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2016年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2003年中共中央颁布《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2016年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此外,党还开展了先进性教育、“三严三实”专题教育和“两学一做”学习教育等。其次,从苏共亡党的启示来说,苏共亡党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党风败坏、严重脱离群众。美国一个专门研究俄罗斯问题小组的负责人弗兰克·奇福德总结说:“苏联共产党是唯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致富的政党。”<sup>④</sup>苏联的最后命运,完全掌握在一批丧失了共产党人气候的“党一国精英”手里,而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而这群所谓的“党一国精英”阶层,已经彻底“变成了一个与1917年夺取政权的革命组织完全不同的实体”<sup>⑤</sup>。

①曲青山:《准确把握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内涵新要求》,《求是》2016年第21期。

②③《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438—1439、1313页。

④纪彭:《特权阶层的兴起与苏共的败亡》,《决策与信息》2010年第10期。

⑤[美]大卫·科茨、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0页。

三是现实之遇：陷阱与风险并存。当前我们不仅面临“三大陷阱”，而且还面临五大风险。就“三大陷阱”来说，第一个陷阱是“中等收入陷阱”。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世行在2006年《东亚经济发展报告》中首先提出的，它是指一个经济体的人均GDP达到世界中等水平（4000美元至12700美元之间）阶段，容易出现新的增长动力尤其是内生动力不足，使得经济发展战略和发展方式转变不能顺利实现，进而造成经济增长速度下降、长期积聚的各种社会问题集中爆发、贫富差距拉大、产业升级转型困难、城市化进程受阻、社会矛盾凸显等<sup>①</sup>。2015年我国人均GDP接近8000美元，处在世界中等水平，再加上近年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面临下行压力，城乡收入差距有逐渐拉大的趋势以及许多社会问题凸显，许多人由此担忧我国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第二个陷阱是“塔西佗陷阱”。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这政府和执政的党派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以负面评价。这就是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提出的理论，即“塔西佗陷阱”。当前，这方面的问题比较严重，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第三个陷阱是“修昔底德陷阱”。所谓“修昔底德陷阱”是指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守成大国，而守成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挑战，于是战争不可避免。近年来，随着美国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促谈成“TPP”等，中国也推进“一带一路”战略、“新型大国关系”、“亚投行”、“RCEP”等，国际社会担忧中美会不会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对此，习近平同志强调：“我们都应该努力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强国只能追求霸权的主张不适用于中国，中国没有实施这种行动的基因。”<sup>②</sup>就“五大风险”来说，第一个风险是经济风险。一方面，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当前我国还面临产能过剩的压力。第二个风险是政治风险，尤其是腐败问题突出。据权威媒体公开报道，十八大以来，有近160名党政军高官落马，其中2016年判了7人<sup>③</sup>。第三个风险是社会风险。当前，中国正步入“发展起来”的历史阶段，“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sup>④</sup>，而且解决这些问题也更加困难，如分配体制不合理问题、收入差距拉大问题、机会不均等问题、人与人的发展处在不公平起跑线上问题、部分既得利益群体形成问题等，这些发展起来以后面临的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sup>⑤</sup>。第四个风险是信任风险。党和政府给予人民的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社会服务等承诺，如果不能按时按质兑现，老百姓不能享受到国家发展的成果或者没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老百姓将很难信任党和政府，这就是习近平同志多次强调的“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sup>⑥</sup>。第五个风险是生态环境风险。当前，生态环境问题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问题，甚至会影响未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这成为党和政府面临的重要问题。

就全面从严治党新挑战而言，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历史之思。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提出过“杜勒斯预言”。1952年，他提出所谓的“解放政策”（“和平演变”），即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要学会用政治战、心理战和宣传战，通过向社会主义国家宣传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促使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1957年，杜勒斯针对中国说：如果中国的领导人继续要孩子的话，而他们的孩子又有孩子，那么他们的后代将会被“和平演变”。即社会主义国家到了第三代、第四代人就会被资本主义和平演变过去。“杜勒斯预言”在前苏联实现了，这对我们有很大的启示，即我们如何防止西方国家对我们“和平演变”问题。二是“古稀之咒”。人类自政党政治产生以来，执政党连续执政时间约70年左右容易出现問題，而70正是中国年龄中的“古稀之年”，因此，许多人把这种现象称为“古稀魔咒”。例如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连续执政71年后在竞选中失败，退出执政

① 贾康、苏京春：《“十三五”：中国直面“中等收入陷阱”》，《人民论坛》2015年第27期。

② 习近平：《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香港《文汇报》2014年1月24日。

③ 《2016年反腐倡廉十大年度词》，《检察日报》2016年12月27日。

④⑤ 《邓小平年谱1975—1997》，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363、1363页。

⑥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368页。



地位,而前苏联共产党也是在执政74年后被解散的。从1949年起到现在,中国共产党已经连续执政68年了,如何破解所谓的“古稀之咒”,即长期执政问题仍然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要课题。三是问题之困。中国发展起来以后所面临的问题更加复杂,能否解决好这些问题考验着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

## 二、历史的选择:确立新的领导核心

全面从严治党的新要求,客观上要求中国共产党确立新的领导核心。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践揭示了一条规律:一个有13亿多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一个有8800多万名党员和440多万个党组织的大党,一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客观上需要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正因为如此,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提出“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

首先,这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和运用。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条基本原则就是要维护党和党的领袖的权威。早在1873年,恩格斯就在《论权威》一文中指出:权威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而不是由人的主观意志确定的;无产阶级要组织起来,需要权威;无产阶级要夺取社会革命的胜利,需要“靠权威来解决”;无产阶级在推翻资产阶级以后,更需要权威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和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否则就“背叛了无产阶级运动”<sup>①</sup>。无产阶级政党的权威突出体现在其政党的领袖上,“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把他们创造出来”<sup>②</sup>。列宁更是强调无产阶级领袖的权威,他明确反对俄国一些激进的知识分子提出的不要任何权威的主张,相反,他认为,无产阶级要完成反对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必须要有权威,他强调,“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sup>③</sup>不仅如此,列宁还特别强调党的领袖权威的作用,认为“造就一批有经验、有极高威望的党的领袖是一件长期的艰难的事情。但是做不到这一点,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的‘意志统一’就只能是一句空话。”<sup>④</sup>这说明,无产阶级政党要形成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党的领袖的权威具有决定性作用。然而,这个由列宁亲手缔造的执政74年的无产阶级政党,却在1991年被宣布解散,究其原因,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这个党的政治纪律被动摇了,党中央的权威没有了,“谁都可以言所欲言、为所欲为”,党内思想混乱、纪律松弛,在这种情况下,“哗啦啦轰然倒塌”,也就成为难以逃脱的命运了<sup>⑤</sup>。因此,“把苏联送入停尸间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苏联人自己。”<sup>⑥</sup>

再从中国近代历史发展来看,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重大历史转折时期都需要党的领导核心。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遵义会议以前,不论是陈独秀还是瞿秋白、李立三、王明,都没有成为全党众望所归的核心,这是党的事业几经挫折、甚至面临失败危险的主要原因。在这重大历史转折时期,遵义会议以后逐渐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核心地位。正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了顶层设计,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党再次面临重大历史转折时期,即中国向何处走的重大问题,在回答这一重大历史转折问题的基础上,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在这个党的核心的领导下,成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此,邓小平深刻地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

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5—338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37页。

③④《列宁专题文集 论无产阶级政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44、344页。

⑤曲青山:《准确把握全面从严治党的新内涵新要求》,《求是》2016年第21期。

⑥李慎明:《苏共的蜕化变质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科学社会主义》2011年第4期。

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没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sup>①</sup>也正是对中国共产党自身加强领导核心建设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反思的基础上,党的十四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几个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指出:“党的历史表明,必须有一个在实践中形成的坚强的中央领导集体,在这个领导集体中必须有一个核心。如果没有这样的领导集体和核心,党的事业就不能胜利。”<sup>②</sup>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正式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这正是结合新的历史转折时期的实际,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领袖地位原理的坚持,而且是对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领导核心建设优良传统的继承。

其次,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艰巨性、复杂性所决定的现实需要。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又面临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在国内,我国已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节点。我们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要解决近7000万人脱贫问题,要适应经济新常态,要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要进行供给侧改革问题,要解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问题。在国际上,我们要应对国际力量对比的新变化,要适应世界经济的深度调整,要面对国际环境中各种复杂严峻的问题。在这样的国内国际形势下,要“确保党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sup>③</sup>,全党必须有一个核心。此外,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有8800多万名党员的大党,要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和宗旨,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以及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等目标,这需要党中央有一个核心。再进一步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一支党绝对领导的人民军队,要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人民军队要担负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参加国家建设事业等任务,必须有一个核心的统帅。因此,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习近平同志的核心地位,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艰巨性、复杂性的现实需要。

第三,这是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实践中自然形成的领导核心,是众望所归。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确立“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从国家、社会和个人三个层面倡导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扎实谋划“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形成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新发展理念,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伟大成就,接续推进了党和国家的各项事业,在治国理政道路上开启了新征程,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拥护,受到国际社会高度赞誉。“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的伟大斗争实践中,事实上已经成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sup>④</sup>。这次六中全会正式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党心军心民心所向,是党、国家和军队之幸,是人民之福。习近平同志这个核心,是经过历史证明、实践检验的,是群众公认、全党认同的,是实至名归、当之无愧的,也是形势所求、水到渠成的。

### 三、新部署:制度治党的现实需要

全面从严治党需要新的领导核心,而新的领导核心要对全面从严治党进行新的部署。十八大以

---

①《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0页。

②《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962页。

③《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第1页。

④人民日报社论:《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人民日报》2016年10月28日。

来,党中央制定或修订了1个《准则》和7个《条例》<sup>①</sup>,仅2016年就有1个《准则》和3个《条例》实施,这说明党对制度治党作了新的部署。“党要管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sup>②</sup>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对我们党95年来开展党内政治生活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总结,分析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新挑战和新要求,认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从严治党。”<sup>③</sup>

党内政治生活是指政党作为政治组织进行教育管理和党性训练的活动,即党的组织生活、民主生活等,包括“三会一课”都是党内政治生活的形式<sup>④</sup>。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以下简称《准则》),不仅对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而且对净化党内政治生态作了顶层设计。那么,为什么要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呢?

一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不仅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而且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党的自身建设的实践证明,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党内政治生活,在长期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以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民主集中制、严明党的纪律等为主要内容的党内政治生活基本规范”<sup>⑤</sup>。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我们党永葆党的性质和宗旨、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要法宝,它不仅是解决党内各种矛盾和问题的“金钥匙”,而且是广大党员、干部锤炼党性的“大熔炉”和纯洁党风的“净化器”<sup>⑥</sup>。

二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具体体现。靠什么来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当然要靠《准则》。《准则》既是党章规定的具体化,也是我们党在全面从严治党实践所形成的一系列行之有效举措的系统化。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依据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新情况和新特点,针对党内政治生活中存在的各种突出矛盾和问题,从“坚定理想信念”、“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严明党的政治纪律”、“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发扬党内民主和保障党员权利”、“坚持正确选人用人导向”、“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制度”、“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保持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sup>⑦</sup>等12个方面作出了具体规定和明确要求,这些规定和要求既对症下药,也治标治本,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具体体现。

三是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求我们修改1980年制定的《准则》。1980年制定的《准则》主要解决的问题是把被“文革”搞乱了党的政治生活恢复回来,既要恢复党内民主,更要加强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既要实现党的思想上、组织上、行动上的拨乱反正,也要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从阶级斗争为纲转到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1980年《准则》对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今后将继续适用。但是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求我们要修改《准则》。“新的形势和任务”就是“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我们面临的执政能力考验比1980年更加突出;改革开放考验在1980年并不突出;市场经济考验是1992年以后才有的,今天更加突出;国际环境的考验和1980年相比有很大不同,危险也更加突出。所以要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来制定修改《准则》。

四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解决党内突出矛盾和问题的迫切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一方面,党内政治生活状况总体上是健康的,但另一方面,党内政治生活中也出现了一些突出矛盾和问题,主要表

---

①一个《准则》是《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2016年10月27日通过,2016年11月2日实施)。七个《条例》是《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2003年12月印发,2015年10月修订,2016年1月1日施行)、《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2016年6月28日通过,2016年7月8日施行)、《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2014年1月14日实施)、《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2013年11月18日实施)、《中国共产党巡视工作条例》(2015年8月3日实施)、《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2015年12月25日实施)、《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2016年10月27日通过,2016年11月2日实施)。

②⑤⑥《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论述摘编》,第21、37、48页。

③《学习活页文选》,2016年第62期,第5页。

④田改伟:《党员参与党内政治生活问题研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2016年第6期。

⑦《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人民日报》2016年11月3日。